

60712/3626

0054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东北人民在解放战争中 选择了共产党领导

刘国梁 郭红婴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1991年7月

论 文 提 要

“八·一五”光复后，中国处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时期，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在严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共执行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与国民党的决战中获得了胜利。

第一，抗战胜利后，是和平建国，还是挑起内战，这是顺从民意，还是逆反众心的关键问题。中共坚持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的方针和斗争，得到了东北以至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第二，是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还是网罗敌伪残余，继续鱼肉人民，是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中共坚决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消灭敌伪残余；国民党大肆收编伪军，到处网罗土匪。东北人民在泾渭分明的事实面前，认清了两党的性质，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第三，是为大多数群众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是人民群众决定拥护谁和反对谁的最显而易见的标志。东北广大人民通过对中共廉洁奉公、热爱群众和国民党为政腐败、欺压人民等事实的比较鉴别，认清了两党的根本区别，使共产党获得牢固的群众基础。

第四，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而广大贫苦农民的向背，决定着革命的成败。中共与国民党维护地主阶

级剥削相反，发动东北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成为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由于中共深得民心，便有160余万英雄儿女参军上前线，310余万民工参战支前，仅短短3年时间，就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全东北，并有百万大军入关作战，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东北人民在解放战争中 选择了共产党领导

刘国梁 郭红婴

在中国人民大众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进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于二十世纪初期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分别在1919年10月成立中国国民党，1921年7月成立中国共产党。从两党诞生之日起，便分别在东北发展党员，成立组织，按各自的纲领开展工作。当时，东北处于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后来又陷于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铁蹄之下，国共两党均处于在野、非法的地位，组织屡遭破坏，党员惨遭杀害，基础都很薄弱。但国共两党相比，由于张学良易帜，国民党军处于全国抗战的正面战场，特别是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成为“四强”，蒋介石被盟国推为“四大领袖”之一等原因，国民党在东北的政治影响要比共产党大得多。“八·一五”光复后，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共产党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在东北。开始，尽管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中共中央派出2万干部、10万部队先期挺进东北，而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不过三四个月，从大后方运进东北的主力部队就达7

个军24万余人。于是，在争夺东北的战场上，急剧呈现出严重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在军事上，20余万美械或半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进攻10万“小米加步枪”之共产党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都相差悬殊；在人心上，由于日伪长达14年的奴化教育和法西斯专制，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和敌伪残余势力，利用苏、美、中（包括国共两党）三国四方争夺东北的复杂形势，进行反动的欺骗宣传，使相当多的群众有盲目正统观念，心向执政的国民党，盼望“中央军”。国共两党两军，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似乎应该强者稳操胜券，弱者一败涂地。但是，结局却恰恰相反，经过短短3年的较量，强者变弱而败，弱者变强而胜。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归根到底是人民的选择，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所预见的那样：“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①那么，东北人民是通过什么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呢？除了历史上的原因（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中，同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等）外，人们主要还是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从他们耳闻目睹的一桩桩一件件的大量事实中，逐渐形成和加深了自己的认识的。而当他们把这种认识再付诸实践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推动他们去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拥护共产党，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从而使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决战中最终取得了胜利。共产

党的胜利，也就是人民的胜利。

(一)

在抗战胜利之初，是和平建国，还是挑起内战？这是顺从民意，还是逆反众心的关键问题。东北人民自辛亥革命后，不仅从未尝到民主共和的滋味，甚至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一直被推在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血海里。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进行残酷的“讨伐”，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把无数的灾难强加在人民的头上，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战乱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使众多家庭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日本侵略者和他们的走狗肆意抓兵、派款、“出荷”，造成广大民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不聊生。“八·一五”光复后，酷爱和平的东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一天仗也不想再打了。他们渴望和平民主、国泰民安、民富国强。中国共产党顺乎民意，光复后仅10天，即1945年8月25日，便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②“三大口号”与和平建国的方针，得到了东北以至全国人民衷心的拥护。

中国国民党怎样呢？毛泽东当时分析说：“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③蒋介石自1927年“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把挑起内战，消灭异

己，实施一党专制，作为既定方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打过10年反革命内战；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于1940年、1941年和1943年发动过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次都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内战，只是由于中国人民和反法西斯战争盟国人士的反对，才没能实现。于是，他们又逃到抗战的大后方，袖手旁观，保存实力，等待胜利，以便夺取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前夕，蒋介石原形毕露了。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连续发出了三道命令：令其嫡系部队“加强进军”，“勿稍松懈”；令伪军“维持治安”，“趁机赎罪”；令解放区抗日部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这三道命令，成为蒋介石颠倒敌我、挑动内战的自供状。在日本侵略者刚刚宣布投降的时候，国民党便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力，并借口受降，紧急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反对内战和亿万人民强烈呼吁和平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手举刀枪、一手拿橄榄枝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其实，和平的一手是为掩护和挑动内战服务的。1945年8月末，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国援蒋打内战的真实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决定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和谈中，中共充分表现出和平建国的诚意，作出了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利益为原则的让步，终于在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于10月12日公开发表后，渴望和平

民主的东北各族人民，霎时欢声雷动，普天同庆。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各省、市、县所在地，相继召开了庆祝大会。那些蒙受过战争灾难的各族广大人民群众，一听说不再打仗了，立即兴高采烈起来，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欢庆“和平”。那些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得知毛泽东敢于深入虎穴，作出许多让步和签订《双十协定》等实际情况之后，无不赞扬共产党人主张和平建国和反对内战的诚意。接着，在组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过程中，各省、市、县都召开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民主政府和临时参议会以及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以实施《双十协定》提出的“政治民主化”等要求。

正当东北人民依照《双十协定》的精神，建设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东北的时候，蒋介石却偷偷地把内战的屠刀强按在东北人民的脖子上。原来邀请毛泽东等去重庆和谈的同时，那个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开始抢占东北人民的抗战果实了。1945年8月31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东北3省划为9省2市，又于9月5日发表了任命9省主席和2市市长的命令，企图借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要挟苏联红军掩护国民党和平劫收“东北主权”。9月17日，蒋介石下令将其在内战时期编订的《剿匪手本》重新印发给各级军官，实际是发出了“剿共”密令。在《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在重庆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策划内战，陈诚等扬言要在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10月18日，蒋介石

将原昆明防守司令部改编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任命杜聿明为司令长官。经过上述准备之后，蒋介石便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支持下，集中精锐部队向东北大举进攻。11月16日，杜聿明依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由美舰运至秦皇岛的十三军和五十二军，攻占了已被共产党军队解放了的东北门户重镇山海关，随后沿北宁路东进和北犯。由于中共努力寻求国内和平和全国人民呼吁和平的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与中共举行停战谈判，并在1946年1月10日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开幕词，说什么“树立民主楷模”，“顾全国家利益”，“正视国家前途”等等。这实际是在演一场双簧闹剧。就在同一天，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议，而蒋介石却以东北是“收复主权”的问题为借口，把东北置于停战协议之外；并密令国民党军在东北“抢占战略要点”。又把七十一军、新六军和新一军相继运至东北，不断扩大东北内战，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同年5月，国民党军侵占长春、吉林等地之后，国共双方又达成东北停战15天的协议，并发布自6月7日停火的休战令。但是没过几天，蒋介石却发动了全面内战，随后又跑到沈阳，策划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再次向南满地区大举进攻，先后攻占安东（今丹东）、通化等地。

蒋介石再三破坏和谈协议和发动对解放区进攻的事实，彻底暴露出他搞假和谈、真内战的反革命面目和妄图独霸东北的罪恶目的；同时也更加显示出共产党主张国内和平的真心诚意。在东北人民面前，打内战则输了理，反内战则赢了理。输理者失掉群众，赢

理者得到群众，这是历史的必然。那些起初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便在事实面前重新认识了国民党，逐步丢掉幻想，起来斗争。那些苦大仇深、开始就跟着共产党走的人们，更加坚信共产党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打败国民党的进攻。共产党的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扩大20余万人，说明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方针已经深得人心。

(二)

是彻底打碎伪满洲国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还是网罗和收编敌伪残余势力，将其改头换面，继续鱼肉人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在东北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是让人民群众认清共产党与国民党谁是人民的公仆，谁是人民的敌人的根本性问题。

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其核心是军队、警察和法庭。马克思和列宁依据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一条普遍性的真理，即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维护无产阶级以至劳动人民的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始终驻有几一万日本关东军，还有大批警察、宪兵和特务，并扶植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日伪提携，以维持残酷的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血腥的法西斯专政。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无条件投降的。在苏军受降驻东北日军之后，饱经忧患的东北人民，最关心最注目的是如何对待伪满政权和敌伪残余势力，重

建什么性质政权的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抗战胜利果实落在谁的手里、人民群众能不能当家作主人的大问题。

东北自“九·一八”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14年的浴血奋战，数以万计的英雄儿女，用血汗浇灌了这块黑土地。光复后的胜利果实，理应归属于东北劳动人民。当时，配合苏军作战的东北抗日联军和处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都先期进入东北，并按照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没收敌伪财产的斗争，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消灭敌伪残余势力，组建人民民主政权，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原来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八·一五”光复后却一反既往，把东北视为在全国实施一党专制的生命线，当即按照“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革命方针，拚命地从人民群众手中争夺东北的每一寸土地。但是，抗战时期躲在峨眉山的蒋介石和退到大后方的“中央军”，一时无法立即调兵东北，便搞起蒋伪同流合污来了。当蒋介石发出伪军“维持治安”的动员命令之后，潜伏在东北的国民党员便纷纷粉墨登场，公开亮出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和各省、市、县党部的牌子。他们勾结敌伪残余势力成立起以伪官吏为核心的各级“地方治安维持会”和以伪军警宪特为骨干的反动地方武装。名曰维持社会秩序，实为没有日本人的日伪政权，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准备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指令东北行营就地就近按建制收编伪军，招降伪警宪特和土匪，改编为保安总队、先遣军、

地下军、光复军、挺进军等。那些伪军警宪特和土匪头目，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司令、军长、师长，一时群魔乱舞。据不完全统计，“九·三”胜利后，国民党收编敌伪武装多达16个系统、37种名目，加委“总司令”、“总指挥”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团长”以下无计其数。以大汉奸、伪军少将姜鹏飞为头目的“铁石部队”，是日军在东北成立的一支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动武装，曾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无数次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冀东人民对其恨之入骨。蒋介石利用垄断受降的权力，将这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伪军，改编成东北保安总队，从冀东空运到长春、哈尔滨、四平等地，成为国民党东北行营的御林军。同时，蒋介石亲自委任姜鹏飞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潜入哈尔滨，在北满地区招降纳叛，编成16个师，占山为王，为非作歹。在那些已为革命武装占领、组建起人民政权的地方，国民党肆无忌惮地进行颠覆活动，网罗敌伪残余势力搞反革命暴乱和武装夺权。国民党在齐齐哈尔、白城一带收编敌伪势力组建的“光复军”，从1945年12月下旬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白城地区先后抢占了9座县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和东北南部先遣军，指令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晓和原日本关东军第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在通化网罗已被缴械的日本关东军、日本在乡军人3 000余人和伪军警宪特2 000余人，于1946年2月3日发动了一次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暴乱，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组建“中日联合政府”。

当中共中央从关内各解放区调遣的10万部队陆续挺进东北以

后，国民党收编的那些乱军叛匪，不堪一击。在北满被其占据的三分之二的县城和西满的部分县城，很快就收复了；从长春逃到临江的伪满洲国御林军，及时被缴械了；通化的反革命暴乱只经过2小时的激战就平息了。但是，国民党收编的众多杂牌部队并没有被消灭，部分逃去国民党统治区，投靠其主力部队；大部分逃到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为匪。当时，土匪人数之多，活动地区之广，声势之大，即对素以“胡子”众多而闻名的东北来说，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帮家伙不同于打家劫舍的一般土匪，而是专以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为敌的政治土匪，是国民党军主力大举进攻东北的别动队。在前有国民党主力大兵压境、后有大量土匪骚扰破坏的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1946年6月作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又于同年7月发出《关于抽调兵力进行群众剿匪工作的指示》。据此，在各解放区，特别是北满地区，由各级党委组织和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部分主力和地方武装，发扬人民军队勇敢善战的优良传统，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用不到两年时间，基本上消灭了多达10万余众的土匪武装，其头目姜鹏飞、谢文东、李华堂以及大大小小的“座山雕”，先后落入人民的法网。

消灭敌伪残余和剿匪斗争的胜利，不仅为建设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且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他们用亲眼见到的共产党镇压汉奸、清除土匪的事实和国民党委任汉奸、收编怂匪的罪行，打心眼里认定：共产党是敌我界限分明，破旧建新，为国爱民的；国民党是认贼作父，复旧戕新，祸国

殃民的。事实揭穿了谣言，那些在光复初受国民党蒙骗而产生正统观念的人，也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转变认识，提高了觉悟，由心向国民党变为心向共产党了。

(三)

是为大多数群众服务，处处爱护群众，时时为群众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处处祸害群众，时时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广大群众认清两党不同宗旨，确定拥护谁和反对谁的最显而易见的标志。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应自觉地接受人民的监督，而绝不违背人民的意志。这是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共产党员一切革命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④“八·一五”光复后，共产党先期挺进东北的干部、战士，所到之处，都是按照这条标准讲话和办事的。由于日伪的奴化教育和敌特的欺骗宣传，在群众对党的政策还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群众便更多地是从党的作风和部队纪律方面来观察问题，确定态度的。当党和政府开仓赈济、打富济贫，积极为缺吃少穿的赤贫户送粮送衣的时候，当即就在群众中萌发出感恩戴德之情。当部队在剿匪中把救出的妇女和缴获的物资交还给被害者的时候，当即就在群众中澄清了所谓“共匪”的谎言。当我们的干部战士逢人称同志、大爷、小朋友，进家

秋毫不犯，还要挑水、扫院子的时候，当即就在群众中发出称颂和赞誉之声。当党发动干部战士开荒种地、发展经济，减轻人民负担的时候，当即就在群众中涌现出拥军支战之举。这样一来，人民群众就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部队看成自己的贴心人，当作自己的子弟兵了。

从1945年11月起，国民党和平劫收了中长路沿线部分大中城市和其主力部队进攻东北以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那些先生活在解放区而后沦为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很快就感到两党两军的截然不同；就是先前没有接触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群众，也逐渐从国民党和“中央军”的所作所为中，明辨出国民党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实质。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表现在许多方面，尽管人民群众一时难以看清上层人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等无耻勾当，却能一眼看破国民党、“中央军”祸害平民百姓的反革命面目。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在暂处优势的情况下也屡打败仗，为扩大兵力和补充减员，一是抓兵，造成众多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是收编地主、土匪武装，使其继续鱼肉人民，群众对他们更是恨之入骨。在国民党统治区里，专门用于镇压革命者和对付穷人的军警宪特多如牛毛，“保甲制”、“连坐法”、“谍报网”近似日伪，群众称之为“二满洲”；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群众称之为“刮民党”。为反抗增加赋税、苛扣工资的群众性罢工、罢课、请愿斗争此伏彼起。特别是国民党军欺男霸女、偷鸡摸狗等卑劣行

为，更使广大群众愤恨至极。国民党军侵占吉林市后，敌人据点的一个营长，从1946年5月末到1947年2月的几个月里，竟抢骗民女与其“结婚”16次，每次都在满足几天兽欲之后又把民女卖到妓院，“营利”达千余万元（国民党币）。驻永吉县乌拉街的敌人在1947年2月调防时，强迫带走青年妇女49人，她们遭到种种非人折磨之后，逃回34人，其中疯了3人、自杀1人，其余下落不明。这种肮脏的勾当，激起了全社会的义愤。1946年10月，国民党军主力侵占辽东地区后，不仅诸多村屯群众的钱粮被征为军饷，连群众喂养的鸡鸭也被洗劫一空。五十二军第二师师长刘玉章指挥国民党军攻占安东后，也不得不向他的上峰杜聿明说：“共军真正做到秋毫不犯，我们的队伍军纪荡然，到处鸡犬不宁，人民怨声载道，实在可虑。”⑤1946年5月，国民党军青二师占领西丰、东丰等地之后，先前在西安（今辽源）组建的中共辽宁二地委率军分区武装转移到农村和山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群众在同一时间里，既看到了国民党欺压百姓的所作所为，也看到共产党为人民兴利除害的革命行动，很快消除了盲目的正统观念，由面敌不面我，变成了面我不面敌。1947年春节，在西丰县胡仙堂村的山神庙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八路军到深山蓄精养锐”，下联是“共产党出古洞普救众生”，横联是“一定成功”。这不只是一个或几个贴对联人发出的呼声，而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人心所向。

在群众中早有这样一句俗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群众运用这个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对国共两党两军的所作所为，进

行比较鉴别，自然而然地就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决定其取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广大群众的向背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广大群众把共产党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把解放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党就有了真正的铜墙铁壁，党所领导的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四)

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谁就能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获得胜利。土地问题，实际是农民问题。在任何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度里，广大贫苦农民的向背，决定着革命的成败。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经验时指出，在一切有农民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合唱”，无产阶级只能是“孤鸿哀歌”。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最主要的就是对农民的领导，只有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取得革命胜利。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3 000余年，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剥削制度根深蒂固，异常残酷：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占人口80%以上，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辛亥革命前，贫苦农民曾一次次地掀起过争取土地的斗争，太平天国起义的领导人还制定了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清朝末年的改良派也曾提出“土地公有”的主张，都因为没有推翻封建社会制度而没能实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封建王朝，曾提出过“平均地权”的设想，但由于没有发动广